

# 藏学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中的固有学科 ——访我国著名藏学专家王尧先生

才 贝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联合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美国西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吐蕃敦煌文献选》、《西藏文史考信集》、《宗喀巴评传》、《水晶宝鬘》、《藏戏故事集》、《西藏萨迦格言译注》、《藏学概论》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历史文献类、语言类、宗教类、文化艺术类等藏学专题论文数百篇并主编相关学术出版物。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史(吐蕃)、藏传佛教及敦煌古藏文。文章围绕王尧先生主要藏学学术生涯,概览其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意欲管窥新中国藏学的发展,展现以王尧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藏学专家,对于中国藏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藏学 王尧 学术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81.4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9)02-001-06

才贝:王尧老师,您好!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之托,冒昧造访,您却以极其谦逊和认真的态度接受了采访,作为晚辈,真是感慨万千。在此,我代表《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和藏学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

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学习藏语文,进行藏学研究,可以说,您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新中国藏学风雨六十年。首先,请您讲述新中国藏学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

王尧先生:藏学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中的固有学科,过去许多年,远的不说,就拿唐朝以来的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有一批官员、学者、使臣、商贾和僧侣关心藏区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留下不少的著作,而以国家力量修撰的官书《旧唐

书》、《新唐书》、《五代史》、《宋史》都有“吐蕃传”的专门章节,而《元史》的“释老传”、《明史》的“乌斯藏大宝法王”、《清史稿》所列的“西藏”专章,可以说是系统地记录了藏族历史。而唐代刘元鼎的《使吐蕃经见纪略》更是一篇第一手的忠实调查报告,颇具文学意味,又很有风土情趣。至于敦煌文献,可以说远在唐代先辈就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当然,很多历史档案是对西藏地方治理的记录,但也可以作为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

上世纪初,1904年英国荣赫鹏上校率领英印军队入侵西藏的枪声,警惊了国人的酣梦,帝国主义企图分裂和霸占我国边疆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西藏一隅也迅速进入了国人的关注之中。一批有深沉忧患意识的学者及研究团体先后在各自的领域展

收稿日期:2009-06-25

作者简介:才贝(1976-)女,藏族,青海贵德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文化史。

开了对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的调查研究。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发急切呼吁：“强邻乘虚而人，肆其挑拨，以求分化，而裂痕乃益深。今日我国家所求者，合全国而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我民族之所求者，合全国各民族而团结为一个民族……”（《五凤苑藏汉词典》序）。

当时不仅是顾先生一人，还有一批学者先后参加到西藏研究的行列中来。他们是张熙（怡荪）、任乃强（筱庄）、韩儒林（鸿庵）、庄学本、谢国安、刘立千、刘家驹、李安宅、于式玉、吴丰培、黄明信、蒋君章、法尊、观空……以及藏族人士格桑泽仁、格桑悦西等，蔚为大观。从东海之滨繁华的大城市上海、南京到重庆、西安、兰州、西宁等地先后有《边政公论》、《新亚细亚》、《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新青海》等等一大批以西藏研究为主要园地的刊物出现，发表了许多反映康藏历史和现状、社会和人民生活文章，甚至还出现过以文成公主为题材的话剧剧本。所有这些都说明国人已经注意到研究西藏、了解西藏与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意义了，有不少文章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增强了凝聚力，值得我们着力去搜集、分析、研究。而《驻藏大臣考》（丁实存）、《拉萨见闻记》（朱少逸）、《西藏图考》、《康藏图经》（任乃强）、《甘青川藏考察记》（马鹤天）、《班禅大师全集》（刘家驹）等一大批重要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上一世纪30-40年代国人已经有了相当力度和相当水平的撰述，但不能否认，当时仍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更全面的、有更大力度的研究工作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新一代学人的肩上了。

1949年10月起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首先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设立了民族委员会（与过去的蒙藏委员会、蒙藏院、理藩院等等中央机构有了明显的不同），依照有关政策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的根本性原则，以共同纲领（即后来的宪法）颁行天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藏学研究也顺应历史要求全方位地展开了。

由于时代所赐，新一代的藏学研究人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藏文文献（包括敦煌文献）对勘；第二对语言、社会、历史和人文作了详尽的调查；第三考古发现的地上地下文物与历史、现实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

才贝：那您介入藏学这一学术领域之后，又有哪些学术事件是您比较难忘的呢？

王尧先生：我接触、进入藏学领域，正是从学习藏语文开始的。1951年5月初，奉调离宁，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只身北上，来到北京，尚在筹备中的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我们。回顾《左传》里有一句话“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对于我们这一批学生是很有教育意义，我们哪里知道开辟一条道路是很困难的。

感谢于道泉教授（1901—1992），他以最大的耐心教导我们如何学习藏语，在我对藏语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我们远离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贡嘎活佛（曾任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经师）是我们在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正是在他的教授下，我开始探索藏文古典作品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遵循于道泉先生和贡嘎上师的教导，我一直努力探索书面语与口语以及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比较。20世纪60年代，民族学院举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敦请西藏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东噶·洛桑赤列（1927—1997）来主持讲席，我承乏一些教学助理工作，朝朝暮暮与他共事前后十多年，后又一道出国参加会议。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由于藏文研究班的无声催促和实际需要，我便开始探索古代藏文文献，后来也就有了关于吐蕃文献研究的一系列研究成果。1981年8月，我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我在会上提交了两篇论文：《藏语 mig（目）古读考》和《宋少帝赵显遗事》，当我离开英语讲稿用藏语向在座学者致意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而震撼，因为过去开会时是不用藏语的，我们中国人是运用藏语的。那次藏学会议，结交了很多国外藏学家，像匈牙利藏学家 G.乌瑞、意大利的毕达克、旅美华人学者李方桂、张琨等等，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1982年夏，我应邀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第三届国际藏学会，在会上介绍了我国藏戏的发展现状，1982年秋，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教了一年书，83年春天，趁便去了巴黎，是应石泰安先生之邀约，尽可能地阅读一些重要的藏文卷子，也纠正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释字中的若干错误。离开巴黎，我又一鼓作气去了伦敦，最大的收获就是接过来托马斯（F.W.Thoms, 1869-1956）教授的《关于西域的敦煌藏文文献》和比利时人威利布散（Vallè e

Poussin, 1869- 1938)编写的《斯坦因搜集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满足了多年的渴望。之后参加国际藏学会议就多了,近来国内的同行出国参加藏学研讨的队伍也越来越规模化了,足以证明我国藏学研究的进展已经是举世公认了。

才贝:在您的藏学生涯中,您与敦煌文献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吐蕃文献的丛书,九十年代又对它们进行重新修订,这些包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等,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料,这些书籍的引用率是非常高的,能谈谈这些著作问世的情况吗?

王尧先生 20 世纪初斯坦因(A. Stein, 1862- 1943)、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等人先后潜入敦煌,将吾国文化宝藏巧取豪夺,席卷而去,遂使敦煌瑰宝流失异邦,西方学者得以垄断把持,居为奇货。其中就有约五千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巴黎和伦敦,吾国学者鲜有知其内容者,更谈不上插手研究了。于道泉教授实为吾国近代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30 年代初负笈巴黎,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师从巴考(J. Bacot, 1890- 1967)研修藏文,深知敦煌藏文写卷之重要,且受北平图书馆之委托,谋求复制、摄影该项写本,准备携回国内,供国人研究之用。当他转赴伦敦教书时,商之于大英图书馆翟理斯(L. A. Giles, 英国汉学名家,中文名字翟林奈,此人专管此项写卷),不期受到百般阻挠,根本不让接触,支吾搪塞,缠磨推托,使其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于道泉先生每提及此事,十分愤慨,痛心疾首。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他回到阔别了 16 年的祖国,回到北平后,立即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羨林教授合作,创设藏语组,是为解放后国内高等学府开展藏学研究之始。旋即在中央政府直接关怀下,在开办国内第一所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学院之时,建立少数民族语文系,而藏文专业被列为第一要务。除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藏语组师生并入外,又从全国若干高校中抽调一部分骨干,集中突击藏语,以适应和平解放了的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需要。于道泉先生知道科研应该服从于当时的中心任务,只能将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心愿寄望于将来。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古藏文研究班,专门培养研究

藏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应该说这是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研究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极大,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已完全断绝,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料,也无从了解必要的学术进展信息。在这种环境下,若贸然提出开展此项研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审时度势,我只好把于道泉先生慨然相赠的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巴考等人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 P. T. 1286, 1287, 1288 等若干写本的法文注解读本)藏诸篋中,以待时日,而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的讲座稿中,略加介绍而已。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众凶肆虐,群魔乱舞,学术资料横遭洗劫,各项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真有今世何世之叹。迨下放“五七干校”,又以待罪之身,听候发落,惶惶然,茫茫然,不知如何了局。但朝夕随身者,竟是这一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在写不完的检讨和自我批评的间歇,利用被发落在炊事房和管果树的空档,断断续续把书中的藏文转写,逐字还原,再抄成便于携带的小卡片藏于衣袋之中,以便抓住农事劳动、炊事劳动之余,玩味琢磨。三年之内,虽然屡遭摧残、打击,心力交瘁,但奇迹般地居然把全书译出,私心窃喜,以为没有白来“干校”一趟。后来,不可一世的“副统帅”机毁人亡,曝尸温都尔汗,我很快回到了北京。

一个偶然的机,接受一项外事任务,居然让于道泉先生负责,我来协助,去解读伊朗驻华大使馆委托的、在该国出土的一份藏文写卷。于教授虽已 73 岁高龄,但乐此不疲,欣然接受此项任务。我们两人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北海西侧文津街 7 号的老馆,不是今天的北图)去查资料。回忆起来,非常有趣。他老人家本是北平图书馆二十年代起的兼任“研究馆员”,对馆内收藏的有关少数民族书刊非常熟悉,可是解放后总也得不到机会清理馆藏有关藏学的外国资料。这一次使他十分吃惊,从北图尘封已久的一大堆一大堆的进口书刊中搜寻、掸土,从而读到许多老朋友如 R. A. Stein(石泰安)、F. W. Thomas(托马斯)、M. Lalou(拉露)、G. Tucci(图齐)以及李方桂、张琨等人的名字,又读到许多新作,更有许多生疏的新人、后起之秀:如 G. I. Jray(乌瑞)、A. M. Blondeau(布隆多夫人)、A. W. Sparian(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L. Petech(伯戴克)、山口瑞凤、今枝由郎等新人新作,都使他有激



动,有时沉思,有时扼腕叹息。

那时生活清苦,可是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的。上面提到的许多国外学者的论著,绝大部分与敦煌文献有关,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认识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做一些实际工作,才能在这一领域内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交出为伊朗驻华大使馆所需要的那份苯教(bon)文书解读(英文本又经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审读一遍)的同时,又草撰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在几位热心于此道的同行中传阅。

此时,在于先生的鼓励下,我动手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的草稿抄录成册,交到青海民族学院,由王青山同志、李延恺同志以汉藏文分两册铅印,在同行者内部流通。后来,陈践同志热情可感,对此亦产生浓厚兴趣,积极参与此项研究课题,协助我把此书的整理、补充、誊写工作担当起来。最后,交到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我国著名的汉藏语专家、古文字学家闻宥教授(1900—1985)亲为题写封面。马雍同志(1930—1985)知道我在译注此书,十分慷慨地把他根据巴考等人的法文译成汉文的“大事纪年”交我参考,也是令人感念的友情。此书出版三千册很快脱销,这是我国关于敦煌藏文写卷的第一本书。此书价值跨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等学科,受欢迎自有道理。

后来,由于我有机会数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碰到国外的同行,接触到不少西方同行的作品;又有机会去欧洲教书,得以访问巴黎和伦敦,亲自去查验、翻阅收藏在那里的敦煌原件,尤其是得到巴黎所藏的,由石泰安教授指导麦克唐纳夫人(即斯巴尼安女士)和今枝由郎编选的两巨册《法藏敦煌文献写卷选刊》,琳琅满目,珠玑毕备。

这时,我们的工作有了大的进展:《吐蕃法制考》、《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写卷(战国策)译解》、《敦煌藏文写卷(尚书)译解》等论文一一发表,并相继出版了数本专著,除上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外,尚有《敦煌吐蕃文献选》、《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西藏文史考信集》等,心中才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在工作中每感汉文史料不足,在解读吐蕃文献时,常有空乏无力之感,很想得到有力的印证。多亏苏晋仁(公望)先生花了二三十年时间整理出版了两本汉

文吐蕃史料著作《(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和《通鉴吐蕃史料》。这样一来,为我增加了底气。吐蕃史料在藏汉两种文献齐头并进的基础上,充实多了。

才贝:您刚才提到敦煌文献中的汉文写卷,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尧先生: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为引人注目。

《大乘二十二问》,一卷,见于S. 2674,首尾俱全,尾题为“丁卯年(787)三月九日写毕,比丘法灯书”。另有P. 2287、S. 4297、S. 2707、P. 2835、P. 2690、北位20等号。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问题共22个,诸如涅槃、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此系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巴宙、上山大峻等学者都曾对该写卷进行过研究、校录。

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P. Demieville, 1894—1979)根据P. 4646号卷子《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若干汉文卷子,撰写出名重一时的《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 1952)。此书对于汉地禅僧在藏族地区的活动、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以及8世纪汉僧(以摩诃衍为首)和印度僧侣(以莲花戒为首)在吐蕃赞普主持下所进行的“顿”“渐”之争作了十分缜密而详尽的探讨,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尼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20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5部,著述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记》、《叹诸佛如来无染着德赞》等3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禅宗在吐蕃传人、兴盛和衰微三个历史阶段。

再如P. 2555号《诗文集》残卷是由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录文后带回北京的。他在1973年将一包

从巴黎录回的关于吐蕃史的敦煌文书交给我,期望我能进行研究、使用。当时正是疯狂的“文革”期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聊作自我娱乐而已。王先生早在1934—1939年间协助巴黎国立图书馆为伯希和写本编目期间就有计划整理、出版其中的汉文吐蕃史料。

万万想不到,1975年王重民先生被迫害致死,过早地结束了他辛勤忙碌的生命。我在悲愤之余,把王先生的手稿录出,找到文物出版社俞筱尧、沈玉成、杨瑾几位好友,请他们设法刊布出来,以告慰有三先生的在天之灵(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

王先生从巴黎携回的P. 2555号卷背面奚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录文也一直珍藏在我身边。邓小南同志发表在北京大学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卷上,题为《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的研究成果,算是履践了有三先生的遗愿。

才贝:八十年代以来,您主编过《国外藏学译文集》、《贤者新宴》等藏学研究丛刊,介绍国外藏学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贡献,对于2007年9月出版发行的《当许噶塘蚌巴奇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您也表示了热切的关注,您为何如此注重学术交流和新信息的掌握呢?

王尧先生:对,后来我就组织了两个刊物,一个是《国外藏学译文集》。我第一次出国是1981年,在国外接触国际藏学会议当时国内就我一个人,当时一看国际(藏学研究情况)以后,我们真是要努力,人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下点功夫去了解了。于是我就把国外研究的成果,组织人翻译(各国文字)成汉文了。我的思想就是我们不要保守,应该就像鲁迅的说法,人家研究的成绩我们要学习,是吧,我们也要知道外国哪些人研究哪些题目,用什么材料以及用什么方法提升我们的研究效果和水平。最近也出了18、19辑了吧。《贤者新宴》也出5期啦。重要的论文,像匈牙利研究吐蕃史的乌瑞作品翻译发表,他当时送了我全套的论文,基本上都翻译发表了,他很佩服藏族文化的,乌瑞的藏文也学得很好。他去世后,我写了文章纪念他,也受到他夫人的感谢信。我编《国外藏学译文集》遇到不少麻烦,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外国的东西是一种污染,要批判我了。我坚持,我们要古今中外一切学

习,后来,得到大家的理解,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了解国外了,不能再闭关自守啦。我们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也要吸取外国的,要知道人家在做什么,知己知彼嘛。然后又编一个刊物《贤者新宴》,吸收我们这个国内同道之人的文章,特别是青年,因为现在文章发表很困难,所以就组织这样一个刊物。唉,最近一年就没有做下去,因为身体很不好,没有努力去做,其实这个刊物可能继续做下。目地就是扶助一些青年人,取得一些研究成果。配合那个翻译译文集,能够让大家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更多的信息。总的来说,我对中国藏学的发展充满了乐观的精神。

最近西藏发现的苯教文献,《当许噶塘蚌巴奇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巴桑旺堆第一时间给我寄来,他对藏族历史有很深的研究,是藏族学者里面很有希望的一个人。他的成绩也很多。他牵头把西藏的一部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巴协》翻译成英文,叫《巴协英译评注本》。他还在做藏文古籍版本研究,都很了不起的,他还出版了英译本《协噶尔教法史》一书,我实在是佩服,也寄希望于他,中国藏学的发展,藏族学者会发挥更多的作用。我对这本新发现的苯教文书的研究寄希望。估计最近藏文文献方面会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最近要出版的《中国古籍珍本文献》里,西藏图书馆就特别介绍了《庞塘》目录写本,这是公元九世纪的书,很了不起,过去我们是见不到的,现在有这个写本出来了,这是最新的信息报道,我相信在藏文文献方面,会有更多更重要的文献出现。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回顾藏学研究,要对藏族学者所做的贡献予以足够的重视,像历史上的米拉日巴(1040—1123)、萨迦班智达(1182—1251)、八思巴(1235—1280)、宗喀巴(1357—1419)和五世达赖(1617—1682)等众多藏族文化名人。他们在史学、哲学和文学、宗教学上的贡献,特别是谈到敦煌文献研究,不能不提更敦群培。

更敦群培(Dge- vdun- chos- vphel)可称为20世纪藏族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奇人和伟人。他毕生都在追求学问,追求真理。在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伦理乃至医学等十来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留下一批专著,名声很大。但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大学问家,竟在48岁的盛年,困厄致死。

我最早了解更敦群培,是从接触其著作《白史》开始的。当时我正着手释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亡友傅师仲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说,这是藏族人最早接触收藏在国外的敦煌卷子的人,他的释读文字,有些见解还是不错的。我认真读了以后,既感到惊奇,又非常钦佩,想不到还有来自安多的如此渊博的藏族大学者。后来,我又陆续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如《智游佛国漫记》等,知道了俄国学者罗列赫将《青史》译为英文时,得到了更敦群培的帮助,不然罗列赫无法完成如此优秀的译本。此后碰到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在赞扬他,怀念他。80年代我到海外教书、读书,又听到一些朋友谈到他,也见到他的惊世骇俗的专著《情欲论》(Vdod-

pavi- bstan- bcos),说了不少为当时难容的话。这是在前人这一类著作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对性的伦理和性的风俗的评述,其中心思想是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正如青年学者杜永彬写出的《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佩大师评传》一书指出的那样,更敦群培开创了藏族现代藏学。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能把藏族学者的成就和学术贡献表而出之,受到同行的关注。

今天就谈这么多吧!

才 贝:好吧,再次感谢您,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 Tibet Studies is the Inherent Subject of our Unified M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An Interview of the Famous Tibet Studies Expert Wang Yao

Caibei

(Research Center of Tibet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Wang Yao is a famous Tibet studies expert in China,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ibet studies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and specialized in the History of Tubo Kingdom,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ancient Dunhuang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terview and his two papers, showed his academic works and thought to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senior generation of Tibet studies experts.

**Key words:** Tibet studies in China ; Wang Yao; academic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 启 事

- 1、凡投本刊的稿件,作者未作特殊声明的,刊用后,本刊同时获得图书、电子版本和信息网络的使用权。
- 2、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书生数字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等。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 3、来稿作者文责自负,如发现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本刊三年内不再刊用该作者来稿,并将协助被侵权人追究侵权责任并保留追究侵权行为给本刊造成的损失责任。
- 4、文后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其他格式请参照《学报》已刊发文稿。凡需订阅本刊的读者可通过邮局汇款,无需索取订单。

《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